

新兴经济体消费前景光明

彼得·贝瑞辛 阿莱克斯·卡尔斯顿

金融危机尘埃落定，全球经济中的一些关键的趋势性变化开始日益明显。其中之一就是全球消费力量开始从美国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种趋势在危机之前已初露头角，但危机对发达经济和就业的打击加速了这一进程。

我们发现，在去年12月危机触底后，全球零售销售增速开始超过危机之前。这是低基线上强力反弹的结果，然而，它更多地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消费的力量。我们认为，未来几年这将是一个持续的主题。

在这个变革之中，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将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而美国中产阶级遭到的打击最严重，因为它们在危机前负债过度，其财富在房价下跌中损失最大。

美国的消费很可能会长期停滞，我们预测新兴经济体今年的消费增速会达到2.8%，明年会加速到6.5%，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后者今明两年增长率大约只有0.2%。

美日欧的消费暗淡得多。经过去年的暴跌之后，美国今年的零售将会稳定下来，在财政刺激和汽车消费回升的带动下，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不错的增长。然而，考虑到疲弱的就业市场、停滞的真实工资，明年财政刺激的退出，以及家庭部门要继续储蓄以巩固资产负债这些因素，今年四季度到明一季度增速只有1%，明年下半年可能只有0.5%。

引入公益诉讼反腐是个好主意

耿海军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葛晓燕日前认为，内地反腐可借鉴美国运用民法反腐的经验——美国民法反腐败的原告可以是一切公民，被告可以是“从事腐败行为或批准腐败行为的官员”，也可以是“负有领导、监督责任，而没有履行职责的官员”。

葛局长的核心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反腐败可引入公益诉讼”。事实上，反腐败公益诉讼不仅存在于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法治国家，亚洲的日本等国都先后建立了类似的制度。

比如，日本东京都知事（即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因为住豪华酒店，乱支交际费，被东京一个区的议员起诉，东京地方法院判市长等3人赔偿40万日元；意大利某城市市长用公车接送外出旅游的妻子，结果被意大利消费者协会联合会告上法庭，并被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6个月监禁……

遗憾的是，我国的民诉法起诉的一条基本要求是原告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否则法院是不予受理的。这样的法律规定使得公益诉讼在我国举步维艰。据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进行的分析，取得全部或部分胜

诉的案件只占17.5%。司法的缺位，再加上监督机制的缺失，无疑助长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当下社会屡屡发生侵吞公款、收受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也就难怪此伏彼起了。

业内人士指出，“公益诉讼是一种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为了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向法院起诉的制度”，而反腐败若能引入公益诉讼，就能吸收最广大老百姓的力量，以弥补检察公诉制度救济范围有限的不足。试想今后在中国，老百姓只要掌握了官员贪污腐败、浪费公款、三公消费的证据，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起诉该官员，而法院也可以将追回的资金拿出一部分奖励起诉者。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最有效的高压态势，就能将少数的腐败分子陷入无数老百姓反腐的汪洋大海之中——贪官也不能生活在真空，你的一举一动都被身边的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你有猫腻，就有可能被身边的老百姓起诉，你还敢那么肆无忌惮的贪腐吗？恐怕没那么大胆了吧。

贪腐面前，每个公民都可当原告。利用公益诉讼的手段来打击和制约官员贪污腐败，在过去十多年获得欧美许多法治国家的认同，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此，有关部门应好好借鉴。

地方税收太倚重房地产危害巨大

陆志明

第十五届全国省会城市地方税收研讨会上披露的信息：目前地方税收结构不尽合理，大部分省会城市的税收收入增长过于倚重房地产业。在目前条件下，应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在房地产行业快速增长的近10年来，房地产行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主要助力。据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5月数据：房地产税收占全部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当时已平均达到20%以上，成为地方税收收入的主力。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房地产行业本身具有强烈的周期性特征，尤其是2007—2008年整个宏观经济层面出现萎缩之后，房地产市场迅速趋冷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地方政府税收来源过度依靠房地产业，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

稳定增长。另外，考虑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土地出让金也来自房地产业，那么实质上地方政府财源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地财政”。财税收入来源的单一化不仅严重影响了地方财政保障的稳定，同时也为房地产业“绑架”地方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方财政是危机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力量，譬如4万亿经济拯救计划，如果政府不能获得足够的财税收入保障，那么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信心和保障将会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何虽然中央政府并未推出正式的房地产业振兴计划，而各地地方政府却在房地产业优惠政策方面频频出手的主要原因。

实际数据也支撑了这一观点，在中国经济逐渐走出次贷危机泥淖的上半年，房地产业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功不可

没。以北京为例，今年1至7月，本市房地产业税收增幅在各税种中一枝独秀，达到12%，增速比今年一季度提高了41.6%；与此同时，同为本轮房地产业复苏的龙头城市，深圳地税部门的数据显示：1—8月，深圳不动产营业税收入增加9.63亿元至41.36亿元，同比增长30.34%。此外，土地增值税收入完成11.97亿元，增幅111.31%；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则完成8.6亿元，增幅为205.4%。

正是因为房地产业“绑架”地方经济，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也无法发挥。正如前文所说的研讨会部分与会官员所表示的那样：房地产业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量价齐跌本应是一轮正常的调整，但由于房地产业对于地方的意义重大，因此倒逼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打断了这轮房地产业的正常调整。也正是因为地方被迫出台政策托市

房地产行业，导致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再次摆脱了经济规律促使其下调的作用。然而，这绝非解决问题根本之路。事实上，也正是地方政府为其自身经济利益出发进行的托市行为，进一步推高了本已远超社会公众购买力之上的房价。而房价脱离公众真实购买力越甚，其投资的空间越窄，而投机则愈加猖獗。而股市等其他资本品市场泡沫破灭的历史早已告诉我们，过度投机的繁荣往往意味着泡沫破灭已经为时不远。

一旦泡沫破灭不但地方经济与财政收入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如当年香港房地产业泡沫破灭之后大量社会公众陷入“负资产”危机，幸赖大陆经济的发展支撑了香港经济走出了危机。而一旦大陆也陷入到同样的经济陷阱之中，又有谁能来拯救呢？

（作者为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

经济时评

为何不向美国提经济要求

孔保罗

占4.4%和7%。教育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如果这些国家在医疗和教育上的开支比例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居民用于其它产品上的开支就会大幅增长。

中产阶级的兴与衰

上述分析还支持我们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即我们正处于全球中产阶级史无前例扩张的黄金时代。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增长，映照着许多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家庭面临的压力。

这些压力，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美国中产阶级正受到失业率上升，房价下跌和高家庭债务的三重打击。调查显示，美国中产家庭的负债杠杆率全球最高。2007年，美国中产阶级平均债务支付占家庭收入的20.8%，比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负担都要重，是真正的夹心层。

医疗开支居高不下。国会预测总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5%上升到2035年的31%，到2060年上升到41%。医疗支出上升并非全部是坏事，但它抑制了家庭购买其它商品的能力，全球可选消费的高速增长将主要由新兴经济体来推动。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四国，将对全球的消费需求产生有力而持久的影响。

（作者为高盛公司经济学家 王贞伟/译）

焦点评论

财经漫画

起航



王志成/图

为何不向美国提经济要求

孔保罗

近些年，西方政府和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在不断地向中国提出经济要求，例如拉动内需，提高消费水平，人民币升值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反观中国，却除了向美国要求保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安全之外，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要求，而且坦率地说，就是这个保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安全要求，也非常空洞，并没有具体的方案相伴。中国是不是应该向美国，向日本，向西方国家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对美国近年来向中国提出的要求进行一番审视，不难发现，很多的要求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可是也不能说全都是有道理的。举个例子来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前不久关于中国的高储蓄导致美国的房价走低的思维，就是颇为滑稽的。至于说美国经济不景气是中国的出口过多所造成的，更是可笑：难道中国的对外出口减少了，美国社会的超前消费问题就会解决？傻瓜都不信。中国对合情合理的部分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对于那些不合理要求，则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过，坚持自己的合理权益并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候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样，对西方社会说，“我就是不干，就是不干”，而是应该巧妙应对，合情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一味地顺从或者一味地对抗，都是不合时宜的。可见，中国不能不对美国的经济要求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反要求，来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尚没有向美国提出经济要求的实力。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相互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是国际社会经济的基本交往原则。WTO就是世界各国彼此之间互相要求的产物。所以国与国之间彼此向对方提出合理要求，与经济实力根本没有关系。

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券，就应该要求美国确保国债安全；中国大量进口铁矿石，也应对出口国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国大量出口焦炭，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也应该对西方国家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且拿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情合理的方案来。至于说到要扩大中国的内需，人民币升值等等，则更是要求美国也相应地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其自身经济情况的绝佳机遇。

在这些方面，中国对西方国家不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就是冤大头！而且做了冤大头对方还不领情！比如说伯南克指责中国高储蓄，就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试问中国解决了自己的相对资金过剩问题，实现了低储蓄，那么还会大量购买美国债券吗？

其三，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不是对抗，而且还会赢得对方的尊重。比如说中国不断公开要求美国保证国债安全，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来保证，中国的经济学家迄今为止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坦率地说，美国政府实际上也不希望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产生安全性问题，因为从原则上来说，这并不符合它的根本利益（有些人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处处都在搞阴谋，其实

是并不了解西方经济，也过高地估计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水准，西方经济中是有索罗斯这种经济大鳄，可是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相对稳妥和正常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不总是在投机的基础上进步的）。可是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政府都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拿出合情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相伴。中国是不是应该向美国，向日本，向西方国家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可见，无论从当今世界的经济交往规则和中国实际情况上来看，中国现在都必须向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提出自己的合情合理的要。

再从技术层面上来看，中国实际上可以向美国提出要求也是非常广泛的和急迫的。例如要求美国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金融危机问题、改善自身的经济疲软，以带动西方经济走出低谷。

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向西方国家提出多少要求，更没有拿出多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合情合理的方案来。这是为什么？显然，这与中国的

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当前国际社会的经济交往规则还很陌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不少经济学家对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的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要么就是继续盲目

引用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经济问题，要么就是跟在西方经济学家之后人云亦云，不能理解问题实质，更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无法向西方提出合情合理的经济要求。

虽然中国有一些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体系，缺乏能洞悉西方社会当今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的学者。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一些人就认为这是西方社会经济崩溃的先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论断，所以还是应该走国有经济的道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鹦鹉学舌，跟着西方一些二、三流的经济学家一起，非常简单化和庸俗化地把原因归结为美国经济的超前消费过度，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危机的产生根源实际上是西方经济本身的脆弱性造成的，其根源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消耗了巨大的资金，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降低了。其实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只要稍加考虑一下就不会陷入西方庸俗经济学家的窠臼：什么是过度超前消费？标准何在？根源何在？怎么来解决过度超前消费的问题？可令人扼腕的是，这些中国经济学家偏偏却没有这样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研究功底不足，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的研究更是欠缺到了令人极其不安的地步。

现代社会，抱着经典著作基本原理不放，或以强盛民族主义色彩的模式来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已经不合时宜。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新型的可以洞悉世界经济本质的经济学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经济应该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己的智慧。否则，即使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仆人，也可能会误国误民的！因为落后就会挨打，经济学的落后也会使国家吃大亏的！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